

“消费降级”判断不成立

匡贤明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正处于从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升级进程中。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来消费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这是居民根据自身实际需求作出的调整，也反映了全社会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新追求。不能单纯地看某个平台或者传统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判断中国出现了“消费降级”。当然，在我国消费结构升级进程中，客观上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最近一段时间，“消费降级”成了热词。不少人引用廉价购物平台拼多多来证明年轻人的消费有降级趋势，同时统计数据也显示2018年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8.5%，这让“消费降级”的判断似乎得到了进一步支持。

在当前复杂变化的经济形势下，对中国消费结构变化趋势的判断，是一个重大战略判断，涉及中国未来中长期发展态势的预测。综合多方面情况看，“消费降级”这个判断不能成立。

第一，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中服务型消费支出占比在不断提升。比如，2013年至2017年，全国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在总支出中的占比从10.57%提升到11.39%；医疗保健支出占比从6.9%提升到7.92%。今年“五一”期间，全国接待国内游客超过1.4亿人次，同比增长9.3%，实现国内旅游收入871.6亿元，同比增长10.2%；“五一”票房同比增长约为19%。总体上看，2013年至2016

年，全国居民服务型消费支出占比从43.71%提高到45.2%，3年提升了1.48个百分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服务型消费支出占比快速提升，是我国消费领域的一个突出亮点，反映出我国正在进入消费新阶段。

第二，所谓“消费降级”更多地集中在物质型消费的调整上。其实，宏观数据已经反映了这一点。2013年至2017年，全国居民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占比仅从6.10%微增至6.12%，中间一年还经历了一个下降的过程。对于物质型消费支出，这个现象是正常的。一般来说，在城乡居民物质型消费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物质型消费不可能再保持高速增长。随着人们消费理念更加强调节约、环保，物质型消费甚至有可能下降。有人把消费降级概括为“花最合理的价钱，买最合适的商品，理性地消费，过更聪明的生活”，其实质并不是所谓的消费降级，而是理性消费、环保消费等。

第三，当前衡量消费总量的指标无法客观衡量消费结构升级趋势。2013年至2017年，我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分别为13.1%、12.0%、10.7%、10.4%和10.2%。有人提出，这不是反映了我国内需市场增长逐步降速的态势吗？不能这样简单判断。截至目前，我国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统计更多地反映全社会物质产品销售情况，并不包括服务型消费情况。尤其是一些发达地区，这一指标难以反映消费真实情况。比如，2018年1月份至5月份，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仅为3.8%，这个数据与实际观感相差甚大。因此，北京市提出了“市场总消费”的新指标来衡量包括物质型消费和服务型消费的总体情况。2018年1月份至5月份，北京的市场总消费增速为8.4%，其中服务型消费支出增速为12.1%。当服务型消费支出已经成为拉动北京消费支出的主力军，再拘泥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

个指标，就会出现误判。
总的看，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正处于从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升级进程中。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来消费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这是居民根据自身实际需求作出的调整，也反映了全社会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新追求。所以，不能单纯地看某个平台或者传统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判断中国出现了“消费降级”。当然，在我国消费结构升级进程中，客观上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如收入分配问题、中等收入群体进一步增长的问题等。把握消费升级的基本趋势，进一步破除不利于消费升级的体制机制，释放出巨大的需求潜力，不仅将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强大动力，而且将成为我国应对某些国家贸易战的底气。最为关键的是，在消费升级的大判断上，不能出现战略误判。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近日，一纸《惠安街道办红白喜事操办标准》引起热议。该标准第一条规定：订婚彩礼不超过2万元，索要彩礼过多者，交公安机关调查，严重者以贩卖人口或诈骗论处。对此，河南兰考县惠安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的解读是，此举是为了倡导婚俗新风。

对于制定标准的初衷是为了倡导婚俗新风，人们容易理解，过高的彩礼不仅给男方造成沉重负担，影响婚后生活，还会形成相互攀比的风气，甚至把婚姻变成一种买卖。但要认识到，索要彩礼与贩卖人口或者诈骗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不能混为一谈。因为，是否限制了人身自由需要由法律来界定，街道办事处并没有立法权力。

当然，索要彩礼过多确实可能构成违法。虽然《婚姻法》未规定彩礼数额以及违反者的法律责任，但规定实行婚姻自由制度，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并规定结婚自愿，不许第三者加以干涉。如果索要彩礼不是女方的意愿，而是其父母的意志，并且因为男方经济承受能力和影响双方感情等原因，违反当事人(女儿)的意志，则会因为对婚姻自由造成干涉而涉嫌违法。

所以说，彩礼的法律界限在于是否对婚姻自由造成干涉，不能以2万元或几万元的数额为标准。如果对婚姻自由造成干涉，别说2万元，甚至1万元或5000元也可能违法，如果不构成干涉，女方把彩礼作为考验男方忠诚度的一个条件，或者男方自愿如此，即便500万元、1000万元，也谈不上违法，更别说构成犯罪。

一般说来，大多数人内心并不认同高价彩礼现象，但一些地方不平衡的性别出生比例以及大量青年女性外出务工，在事实上造成了当地男青年难找对象的客观事实。压力之下，一些人不得不在彩礼上竞相追高。对此，相关地方应关注高价彩礼的深层次原因，除了引导人们树立性别平等观念，更要注重发展当地经济，留住并吸引年轻人在当地就业，进而改善青年人性别比例，降低彩礼负担。

倡导婚俗新风的规定，初衷良好，但屡屡引起热议甚至招致批评，不仅在于有些规定闹出了法治笑话，更在于没能抓住问题的根本，还往往会把人变成两面派，表面上遵守规定，背后却设法对付规定，绕开规定行事，更使得那些老实遵守规定的人“吃亏”。这样一来，不仅不利于养成按规和法律行事的习惯，不利于树立法律信仰和规则意识，反而会促使人们想办法应付相关规定，不把规定和法律当回事。因此，有关地方今后倡导婚俗新风必须讲求法治精神和求真务实，在相关细节上稳妥把握。

认清彩礼的法律界限

吴元中

依法依规打击“不合理低价游”

潘铎印

近些年，“低价游”饱受诟病，却一直屡禁不止。日前，央视曝光了云南一些地方“不合理低价游”问题。云南省及大理、保山、德宏有关部门立即作出部署，对相关涉事企业及人员开展调查，6家购物店、3名导游和1家旅行社被查处。

“不合理低价游”在一些地方长期存在，根源在于旅游市场畸形发展。许多旅游企业违反法律规定，给导游低廉苛刻的工资待遇，并与提成挂钩。如此一来，导游收入无保证，只能对游客下手，想方设法让游客少逛景点、多购物，自己多拿“回扣”。地方政府及监管部门执法不严，也纵容了违法经营的存在。同时，也有一些游客贪图便宜，一味追求低价，从而给低价游留出了市场空间。

目前，“不合理低价游”严重扰乱了旅游市场正常秩序，损害了游客的合法

权益，已成为影响全国旅游市场的顽疾。打击“不合理低价游”要依法依规。相关职能部门应拿出整治决心，严格执法，从旅行社和旅游经营者入手，把相关法律不折不扣地落实在每一单旅游合同中、每一次旅游服务中，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对违法违规行径绝不姑息。

打击“不合理低价游”，还应强化事前防范、关口前移，加强旅游市场管理，建立不良从业者及从业人员黑名单制，让“守法诚信”成为旅游企业的市场准则，同时平衡好旅游生态各个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实现标本兼治，让旅游回归健康发展的生态。游客自身也要树立理性消费观、旅游观，摒弃贪图便宜的心理，抵制旅行社抛出的各种低价游诱饵，让“不合理低价游”失去市场。



“尬厕”

朱慧卿作 (新华社发)

“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当前，我国进入脱贫攻坚关键阶段，乡村振兴稳步推进，坚决推进农村厕所改造对新农村建设具有标志性意义。但是，中央高度重视并不断出台相关方案及措施的农村厕改，在一些地方却“变了味儿”，出现了半吊子的“尬厕”——没墙、没顶，只有蹲便器，致使裸露在外的蹲便器随处可见，这是山西娄烦县2016年一些农村厕改后的厕所。该县卫计局一位负责人说，厕改资金由市县两级财政负担，市级财政能保证，但县级财力捉襟见肘，所以厕所只建成地面部分，围墙和顶子需要村民自己负担。对于厕改未完成村的村民来说，他们最迫切的希望是政府能把厕改工作做扎实，不要为了完成数量而忽视质量，让他们能踏踏实实地上个厕所。
(时 锋)

让意见箱真正成为“连心箱”

袁 浩

意见箱是为群众提意见设置的，本意是为了方便群众反映问题，能让一些当面不便提的意见和建议有一个表达的渠道，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体现。然而，媒体调查发现，现实中少数单位虽然挂出了意见箱，却形同虚设，由于无人维护，意见箱落满灰尘污渍，有的干脆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锁，长期没人开启。

意见箱虽小，但却体现了相关部门对群众意见的重视，有了意见箱，并不代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关键还是要做好后续管理工作，切不可使意见箱沦为摆设，这样不仅有损单位形象，还会疏

离政府部门同群众之间的关系。要想让意见箱不蒙尘，一是要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安排专人负责，定期收集群众所提意见，分类登记，及时调查核实，并向相关领导和部门反馈，对于好的意见与建议及时采纳，让意见箱经常“保鲜”。二是要建立健全奖励机制，对有价值的建议和举报给予适当奖励，营造良好的舆论监督氛围，让意见箱真正成为“连心箱”。三是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及时解决群众提出的问题，真正做到让群众有意见就提，有想法就说，让意见箱成为联系群众的纽带，提升党和政府公信力的“宝箱”。

董希淼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防风险不能忽视非金融机构

相比金融机构，如何对形形色色的非金融机构实施有效治理，通过治理清除害群之马，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成为监管部门的一大挑战。金融监管部门防范金融风险应突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即对持牌和非持牌机构坚持统一监管，规范金融秩序，引导金融业健康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金融监管全覆盖，不留死角和空白点，进而减少监管套利，降低风险隐患。

陈音江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

异地业务不办增加消费者负担

运营商全国一体的资费跑在了前面，但全国一体服务体系却有些跟不上脚步，销户、换卡、换套餐，各类重要业务只能回到归属地营业厅办理。尽管异地业务不办理是为了防止冒名顶替、电信诈骗等行为，但这一解释在信息化时代仍站不住脚，这是明显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免除经营者责任的不公平、不合理规定。既然无论是异地还是本地办理，运营商都需要对办理者身份实行有效审核，就不能以安全为借口增加消费者负担。

颜建周
中国药科大学研究员

多因素致终端药价变化“慢半拍”

终端药价变化“慢半拍”是因受到了多重因素影响。比如，在今年5月1日前，国内市场已经库存了一定量的进口抗癌药品，这部分药品不享受降税政策，价格会与之之前保持一致。而且，这部分药品库存销售完毕仍然需要一定周期，因此在短期内价格没有出现明显变化。药品价格受多方因素影响，如研发和生产成本、原辅材料价格、市场供求关系、市场竞争环境、同类竞争产品定价等。在降税政策出台后，企业会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决定药品的市场价格。

欢迎读者就热点经济话题发表评论、漫画，来稿请发至：mzjjgc@163.com
本版编辑 马洪超 徐 达

警惕房企高负债率风险

盘和林

近日，有研究机构发布报告指出，2017年主要上市房企(A股、H股和其他)负债规模与增速继续加大。数据显示，2017年末，60家重点房企有息负债占比达84.1%，增加3.1个百分点。2017年，总有息负债超过千亿元的房企有14家，较2016年增加6家，90%的房企总有息负债在上涨，且超过一半的企业负债增速有所增加。

与一般企业负债相比，房企负债具有数量大、期限长，受宏观经济和政策影响大、风险高等特点，这决定了绝大多数房企貌似实力强大，但实际上却很脆弱。因此，房企高负债及其可能导致的风险亟待引起监管层重视，尤其是要警惕房企高负债率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

目前，房地产行业整体负债率达79.42%，房企杠杆率处于历史高位。在高负债的同时，房地产行业近年来普遍保持着营收与利润的双增长，资产回报率保持着较高的比率。有关数据显示，130家房地产企业今年一季报实现营收和净利润分别为2998.84亿元和334.5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87%和39.93%。为什么房地产企业净资产回报率不断增长，但资产负

债率却居高不下呢？这反映出房地产企业在以高负债率为代价提高资产回报率。一般来说，造成企业高负债率的原因主要在于其经营模式，房地产行业是负债经营的典型，从土地、建设、销售等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是借用金融机构如银行、信托以及购房者的资金来完成的。

房地产企业大多采用预售制度。一方面，这意味着开发商可以预先得到购房者的定金，这部分定金往往被用于房屋后续的开发建设中，也就是说，房企实际上是在用购房者的资金建设开发房屋，自有资金较少。而且，房屋预售在竣工前只能称为负债，竣工后才能转换为收入，预售额越大，负债越多。

另一方面，目前房地产开发普遍存在快速开发、推盘过快的现象。继2017年房地产销售繁荣后，房地产企业竞相争夺高价地，因而纷纷拓宽融资渠道，这必然会提高房企的负债率。举例来说，若房企向银行融资，向银行借钱买地、建楼，建好后抵押给银行又可继续获得贷款开发楼盘，如此往复，形成了高负债率的资金链。

不难看出，房企日益增长的资产负债率，实际上是房地产行业高杠杆的真实写

照。房地产企业是高杠杆企业，融资环节关系着房企生命线，资金实力代表着拿地、经营、价格等方面的话语权，决定着房地产企业的偿债能力和发展规模，因而获得低成本融资和强化现金回报率已经成为房企得以生存壮大的关键。

从房地产企业的角度来看，高杠杆是高利润、高回报的重要实现途径，高杠杆游戏对房企具有很大诱惑力。不过，从防控金融风险 and 参照别国经验的角度看，房企自有资金有限，投资量大、建设周期长、资金回收慢，特别是极易受到宏观经济和相关政策的影响。因而，资金尤其是信贷资金不能无限制地流入房地产行业，必须防止催生房地产泡沫进而造成金融风暴。

与此同时，我国房地产高度依赖信贷资金，不断上涨的房价及炒房收益形成了强大的“虹吸效应”，给实体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面对房企高杠杆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房企唯有积极利用宏观调控政策进一步去杠杆，不应存在融资环境可能会放松的侥幸心理。那些净负债率高、债务结构不合理、融资渠道单一的房企，更应该积极思考如何保证企业资金链的安全，将负债率降低到一个比较健康的水平。



高杠杆是高利润、高回报的重要实现途径，对房企具有很大诱惑力。不过，房企负债具有数量大、期限长，受宏观经济和政策影响大、风险高等特点，这决定了绝大多数房企貌似实力强大，但实际上却很脆弱。因此，房企高负债及其可能导致的风险亟待引起监管层重视，尤其是要警惕房企高负债率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